

# 关于刀形端刃器起源的分析

周润垦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16)

It is wildly disputed as to the origin of sword-like end-blade object, however, a practical stone end-blade object unearthed recently can explain the beginning of manufacture thoughts.

Key Words: Sword-like End-blade Object Practical End-blade Object Ivory Seal Origin

**内容提要** 对刀形端刃器的起源目前学界仍争议不一,而考古发现中的一种石质实用端刃器很可能就是它的制作理念之源。

**关键词** 刀形端刃器 实用端刃器 牙璋 起源

**中图分类号** K871.1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常发现有这样一种器物:器身扁平,长条状,刀形,其刃不在长边而在短边,有凹弧刃、“V”字形刃、平刃(近平刃)和“戈首”形刃;阑有单阑、双阑之分,阑端侧或阑间侧常见若干小细齿,阑间多数阴刻有平行线纹或菱形网纹;柄部一般呈长方形状,柄上或阑上常钻有一穿孔。此种器物目前发现有玉、石、骨、角、青铜等五种不同质地的制品,其中主要以玉、石质为主,数量最多,骨、角、青铜质地的则发现较少。有的发现于墓葬内,有的出土于祭祀坑里,有的是调查采集而来。其年代从龙山时代一直到西周时期均有发现。

自从清末的吴大澂把这种奇特之物考订为《周礼》中的“牙璋”,后来学者大多沿用此种命名。1983年夏鼐在他的《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中谈到由于它的功能目前尚不清楚,所以为谨慎见,还是称为刀形端刃器比较妥当<sup>[1]</sup>。笔者在此依夏鼐先生的意见,称此为刀形端刃器。1986年和1987年发现的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里众多刀形端刃器的出土<sup>[2]</sup>,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1991年在香港大湾M6里出土了一件刀形端

刃器<sup>[3]</sup>。此件刀形端刃器的发现引发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莫大兴趣。此后不久,众多学者相聚香江,从不同角度对刀形端刃器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各自独特的见解<sup>[4]</sup>。其中的热点之一就是关于刀形端刃器的起源问题。但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笔者在此不揣浅陋,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刀形端刃器的起源,据笔者收到的材料分析,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以戴应新<sup>[5]</sup>、林巴奈夫<sup>[6]</sup>、邓淑萍<sup>[7]</sup>、张学海<sup>[8]</sup>、王永波<sup>[9]</sup>等为代表,认为刀形端刃器起源于农具中的“骨耜”,如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图一:1~6);第二种,认为其原型当为石、骨、木质之铲、锄、耜之类的农业工具,如郑光<sup>[10]</sup>;第三种,认为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中的獠牙勾形器(图一:7),如涂白奎<sup>[11]</sup>、王永波<sup>[12]</sup>。

目前持第一种看法的学者较多。但是从比较中可以看出,“骨耜”除了刃部与凹弧刃的刀形端刃器相似外,而刀形端刃器的刃除了凹弧刃外,尚有“V”字形刃、平刃(近平刃)和“戈首”形刃等,其它方面令人很难把两者联系起来。刀形端刃器扁平长条形,柄部有穿孔(晚期的穿孔在阑上),而

“骨耜”宽短,其穿孔在器身上,且常是并列双孔,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说来,在探讨器物间的起源和演变关系时,主要是看器物间在形制上的相似性,进而推测两者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这是合理的,亦是可行的。但是在比较两者间的相似性时,要从整体上把握,追求其形似、神似,而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

第三种的说法同样有不当之处。涂白奎等推测獠牙勾形器的柄部和獠牙的接触部位应有绳索绑缚,而刀形端刃器的“栏正是绳索的象征”,所以獠牙勾形器的形状与刀形端刃器大致相合。我们知道早期的刀形端刃器是单阑的,这种阑的作用和戈、有肩石铲、石镑的“肩式阑”的作用相同,是为了防止器物滑脱而加工出来,之后再用绳索捆绑,很明显不是“绳索的象征”。另外,他为了解释为何刀形端刃器的刃部弧度没有獠牙勾形器的前端两歧外撇的大时指出“这种不同显然与制作器物的材料有关。在使用玉、石磨制刀形端刃器的时候,将其两歧内收,一方面是迁就石材的性质,避其易折之病,另一方面也使得这种制作省时省料,方便易行”<sup>[13]</sup>。若是怕其“易折”,何不如把刀形端刃器的刃部、身部、柄阑部均制成圆柱状(或刃部如獠牙一样,圆锥状),而要制成如此之薄的扁平长方体?若要省时省料,为何要制作如此大件的刀形端刃器,有的甚至长达66厘米<sup>[14]</sup>。很明显,第三种的说法亦难以令人信服。

第二种的观点倒是切中事实,可惜很笼统,亦没有详细论证,下文试在以往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刀形端刃器的起源作一简要的探讨。

在探讨之前,我们应先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神木石峁中的无阑的条形端刃器(本文暂名,其特征可界定为:整体形状呈扁平长条形,无阑,刃在短边。见图一:8~10)不是如戴应新所说的是由刀形端刃器改制而成<sup>[15]</sup>,恰恰相反,其中部分是原创,另一部分是由其它器物改制过来的。何以如此讲?

首先,戴应新说,刀形端刃器的“生命仰赖于首端前伸的一对大牙(既刃尖,笔者注),倘其中一个断失,那么它就不再配作祈年的礼器,从而失去继续使用的价值”,作为刀形端刃器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于是只好加以改造,磨制成其它各种形状,派充新的用场<sup>[16]</sup>。很明显,戴应新认为,“牙”是刀形端刃器的生命所在,无“牙”只好改作它用。从戴应新对石峁SSY30的描述中可知,其“牙”曾断过,那么为何这种断“牙”的“失去继续使用价值”的刀形端刃器,没有被改制或被戴认为是由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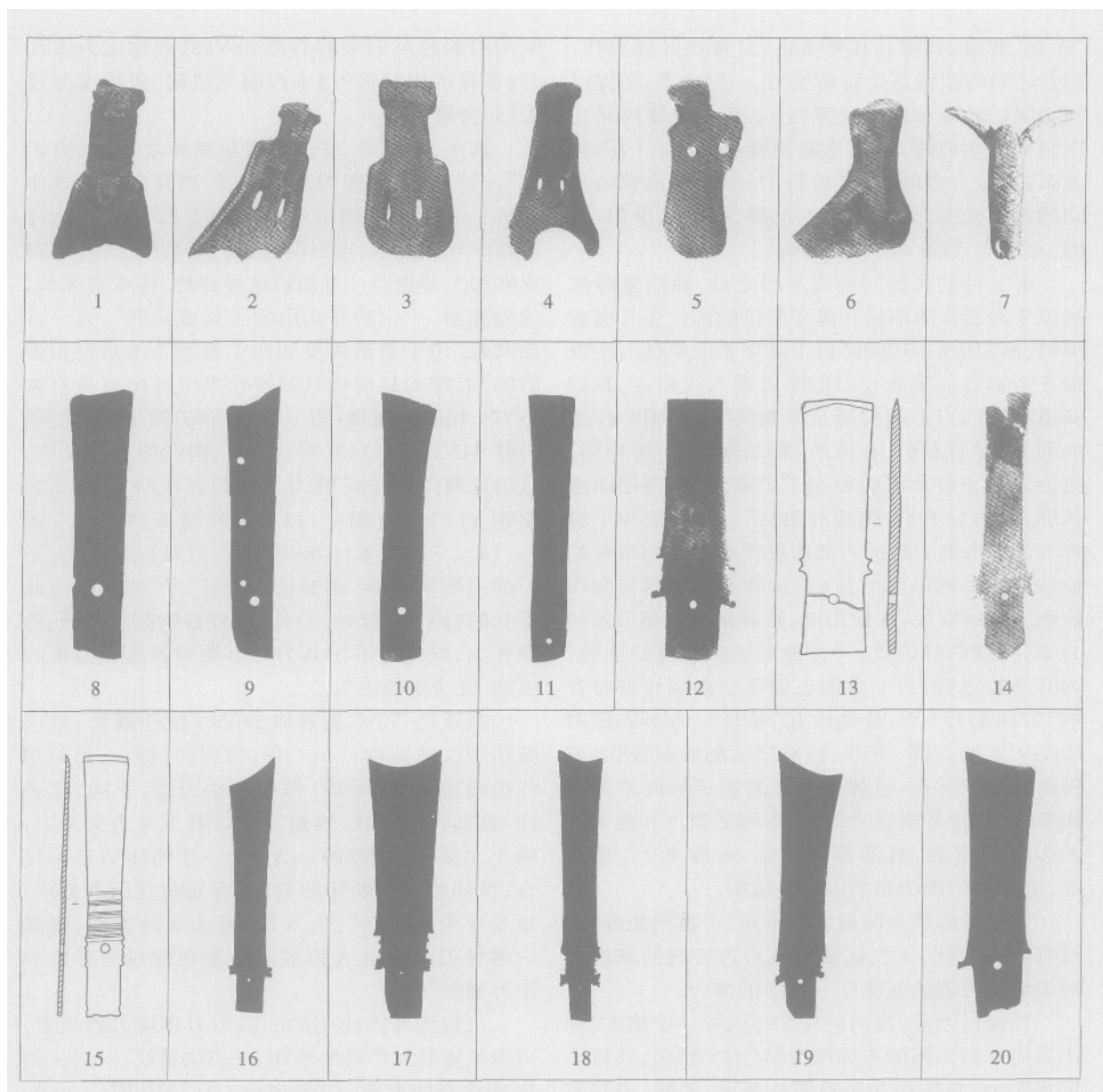
形端刃器改制而来的石峁SSY85(戴称之为多孔刀)那样的形状呢?尚未改制完成吗?很难说的过去。此为疑点之一。

其次,看石峁SSY29,戴应新称之为“斜刃铲刀”,乃“系牙璋(即刀形端刃器)两牙断失后改作而成……可用于修治兽皮和加工器物”<sup>[17]</sup>。此件器物厚0.3厘米,这么薄且长的器物用于“修治兽皮和加工器物”?一方面说这种器物“体型扁窄长,质地脆弱,……断非实用的工具或武器”,另一方面又说“用于修治兽皮和加工器物”,不是自相矛盾吗?有趣的是桐柏月河春秋墓中亦出有与石峁SSY29相似的器物(图一:11),同出的还有刀形端刃器94NTYM1:142(图一:12),两者均为平刃<sup>[18]</sup>,难道这两件也是因“断牙”而改制成的吗?那么罗圈峪YL:10<sup>[19]</sup>(图一:13)、汪家屋场JW:3<sup>[20]</sup>(图一:14)、三星堆K1:78<sup>[21]</sup>(图一:15),甚至所有平刃的刀形端刃器,亦都是因断过“牙”而改制成此形状的,显然不是的。另外,此件器物曲线流畅,造型秀美,丝毫看不出其为刀形端刃器改制而来的痕迹。此为疑点之二。

疑点之三,则是石峁SSY85这件器物。戴应新谈到这件器物“…一角(指刃尖)特长,另一角伸出较短,犹保牙璋(即刀形端刃器,下同,笔者注)首部特殊形状,惟短牙刃口磨至背边交叉处,短小尤甚,与牙璋的一牙长,一牙稍短情态不尽合,可知短牙乃断牙的基部,磨光断茬以求美观,显系牙璋所改制”<sup>[22]</sup>。又说“若非牙璋改作,则其一端磨刃而且呈Λ形或月牙形便成没有必要和不可理解”<sup>[23]</sup>。

从目前考古出土的凹弧刃刀形端刃器来看,刃尖长短并无严格的规律,一刃尖特长,一刃尖特短是常有的形态,如包包台GZ:1<sup>[24]</sup>(图一:16)、二里头VM3:4<sup>[25]</sup>(图一:17)、二里头VIKM7:5<sup>[26]</sup>(图一:18)、望京楼XW:1<sup>[27]</sup>(图一:19),石峁SSY13<sup>[28]</sup>(图一:20)。所以以刃尖长短来判其为改制品,实不可取。假设这件器物是由刀形端刃器改制而成的多孔刀,那么改制者为何要把“断牙”磨成“短牙”,而留着尖且锐的长牙呢?既然他要改制成石刀,就应把长刃尖亦“磨光”或再切割成斜边,而留着有危险的尖且锐的长牙吗?

本文认为此件器物恰是由多孔石刀改制成的条形端刃器。这件器物“长边刃口颇厚钝,宽的一端呈Λ形,薄锐有刃”<sup>[29]</sup>。很明显,多孔石刀改制成条形端刃器,必须把原先较锐的长边刃磨得“厚钝”点,这才不至于伤手,握持更舒服。而把多孔刀



图一//

1~6. 河姆渡骨耜(引自《中国农业考古图录》) 7. 獐牙勾形器(引自《大汶口》) 8~10. 神木石铲 SSY30、SSY85、SSY29 11、12. 桐柏月河 94NTYM1: 86、94NTYM1: 142 13. 罗圈峪 YL: 10 14. 汪家屋场 JW: 3 15. 三星堆 K1: 78 16. 包包台 GZ841 17. 二里头 VM3: 4 18. 二里头 VII M7: 5 19. 望京楼 XW: 1 20. 神木石铲 SSY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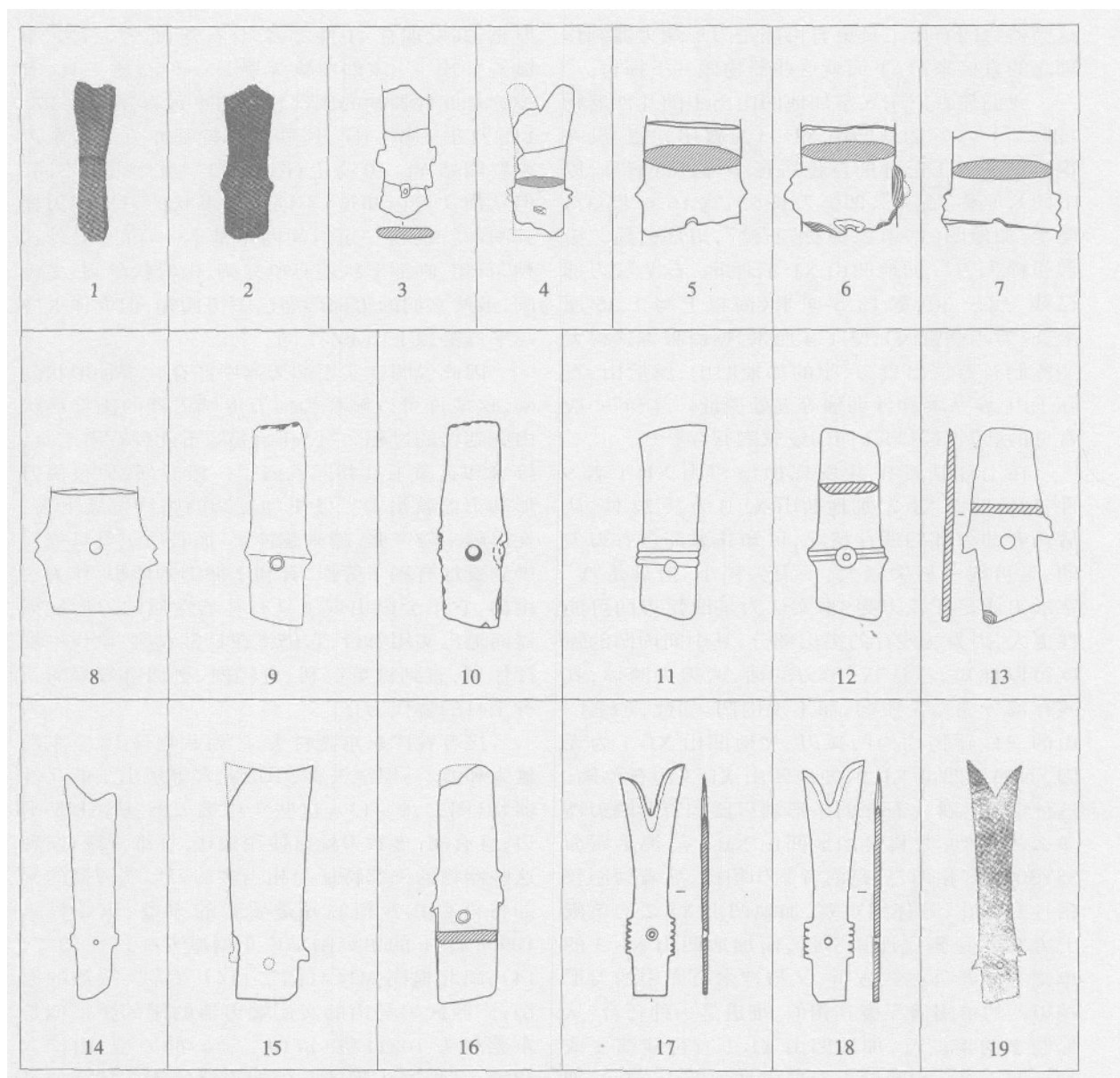
的一侧窄端磨得“薄锐”,才符合“端刃器”的特征。其“长牙”“短牙”恰体现了改制者的“因材而制”的聪慧头脑。条形端刃器的长刃尖刚好处在多孔石刀的长刃边线上!又因这三件器物的大小与石铲刀形端刃器的基本相同,质地亦同为墨玉,且出自同一地区,因此认为它们是同时期的器物。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神木石铲出土的玉石类器物中存在一种无阑的条形端刃器,这种条形端

刃器在当时先民的概念中是存在的,是先已有之。如此,我们再回头探讨刀形端刃器的起源。

众所周知,木质的器物是很难被保存下来的,尤其是龙山时代的器物。而骨质、角质之器物虽较木质易保存,但多数只被制成小件器物,如骨锥、骨镖、骨匕角锥等,而“骨耜”已如前述,在形制上不太可能演变成刀形端刃器,在地域分布上亦无普遍性。在考古上所见保存最多、最好的当属石质





图二 //

1~3. 加地凹山 XJ: 1、XJ: 2、XJ: 3 4~7. 寨顶上山 PZ: 1、PZ: 2、PZ: 3、PZ: 4 8. 涧沟 HJ57: 1 9. 村头 T0908 ③: c  
10. 马山 WM64: 1 11. 太和岭 NT: 1 12. 窖头脚 MJ: 1 13. 龙穴 ZL: 1 14. 增城 GZ: 1 15. 桅岗 M1: 4  
16. 村头 T0811 ③: b 17~18. 三星堆 K1: 275、K2 ③: 174 19. 汪家屋场 JW: 2

器物,所以要探讨主要为玉、石质的刀形端刃器的起源,最大的可能是在石质的工具中找寻。

我们注意到考古发现的石器中有一种实用端刃器(图二:1~13)。该器物形状一般是长方形,多数有阑、穿孔,器体较厚重,刃处有使用痕迹,有的打制粗糙、磨制不精。就整体形状来说,与刀形端刃器十分相似。这些器物分别出土于广东兴宁加地凹山<sup>[30]</sup>、广东平远寨顶上山<sup>[31]</sup>、河北邯郸涧沟<sup>[32]</sup>、广

东东莞村头<sup>[33]</sup>、广西武鸣马山<sup>[34]</sup>、广东南雄太和岭<sup>[35]</sup>、马坝窖头脚<sup>[36]</sup>、中山龙穴<sup>[37]</sup>、香港大湾<sup>[38]</sup>。杨式铤曾提到其中的一些器物与刀形端刃器为“类似器物”<sup>[39]</sup>(图二:3、4、6、7、11、12、13)。王永波亦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其中的若干器物是实用器<sup>[40]</sup>(图二:4、6、7、9、11、12、13)。可惜均未作详细探讨。本文在他们的基础上又收集到了3件器物(图二:1、2、8),并认为与骨耜、獠牙勾形器等相比,象

这类器物的石质工具更有可能是刀形端刃器制作理念的直接来源。下面就这些器物做一下探讨。

我们先看广东兴宁加地凹山出土的几件器物(图二:1~3)。加地凹山 XJ: 1(为叙述方便,没有编号的均以出土的首位拼音字母进行编号,以下同),原称“石叉”,凹弧刀长 55、宽 16.6、厚 3.1 厘米。加地凹山 XJ: 2,原称“石戈”,刃部已残;援部粗糙无刃。加地凹山 XJ: 3,原称“石戈”,刃部已残,残长 30、宽 13.5 厘米(简报上写 1.35 厘米,应为印刷错误),厚 1.4 厘米。据简报称这种大型琢制石器仅出自“兴宁的加地凹山、屋后山、石际子山、窑头岭和沙圳璠等五处遗址。”且和“一般常见的磨制石器与几何印纹软陶共存”<sup>[41]</sup>。

在上述遗址中共发现加地凹山 XJ: 1 者 9 件,加地凹山 XJ: 2、加地凹山 XJ: 3 者共 22 件。从后两者的刃部的残存情况,可知其刃部是有刃尖的,且可能一刃尖稍大,一刃尖稍小。但是是“V”字形刃或是凹弧刃呢?本文认为是凹弧刃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从残存的突出部分,其中间内凹的弧度可以推知。若是“V”形刃的话,两刃尖断掉,其残存部分应是尖锐的,而不现内凹。如此,加地凹山的三件器物均为凹弧刃。加地凹山 XJ: 1 为无阑,而加地凹山 XJ: 2、加地凹山 XJ: 3 均有单阑。这种情况与神木石峁的条形端刃器和刀形端刃器多么的相似。尤其是加地凹山 XJ: 1 与神木石峁 SSY30 非常相似,只是前者制作粗糙,后者磨制较精且有穿孔。若仔细观察,加地凹山 XJ: 2 的单阑上方和器身侧线连弧不折,而加地凹山 XJ: 3 的单阑上方器身侧线方折,又与神木石峁中的刀形端刃器的单阑情况极其相似。难道是一种巧合?从形制学的角度看,加地凹山 XJ: 1 有可能演变成加地凹山 XJ: 2,然后再发展成加地凹山 XJ: 3,即从无阑发展到有单阑,从无穿孔到有穿孔。而加地凹山 XJ: 3 全身磨光,似乎又在暗示出制作水平的进步。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神木石峁的单阑的刀形端刃器是由无阑的条形端刃器发展而来的。而无阑的条形端刃器是由实用端刃器如加地凹山 XJ: 1 者发展过来的。

我们再看广东平远寨顶上山、河北邯郸涧沟的几件器物(图二:4~8)。平远寨顶上山的四件器物,原称“石耜”。平远寨顶上山 PZ: 1,残长 29.5、厚 2 厘米。此种器物据简报称,过去在广东汕头、梅县、韶关等地区均有发现<sup>[42]</sup>。可见此种器物在当时很普遍。邯郸涧沟的一件,原称“石锄”,器体

厚重,共发现有 41 件之多。与石斧、石刀、石凿、石铲等伴出<sup>[43]</sup>。该件器物无疑是一种石质工具。有趣的是此件器物的阑部特征与平远寨顶上山 PZ: 1 的几乎一模一样。这种阑部特征亦见于山东沂南罗圈峪 YL: 10 身上(图一:13)。虽然刃部不同,但从前文可以知道,不同刃部形状的刀形端刃器其阑部特征在一定时间内是基本一样的。另外这种“石耜”阑部形状还有单突阑、山峰状单阑、多齿阑,虽然它们的刃部形态已不得而知,但大体上应与平远寨顶上山 PZ: 1 同。

因此说明在实用端刃器中亦存在多种形状的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刀形端刃器的阑部形状由简到繁的过程。它们开始起源于此种石质工具,接着和石质工具共同发展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刀形端刃器就沿着一条更加复杂的路线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夸张,越来越神秘。而石质工具只能发展到更加有利于劳作,有利于捆绑的地步。作为实用器,它不会因出现了具有礼器性质的刀形端刃器而退出实用舞台,它仍将在日常农耕、砍伐中发挥作用,直到被更锐利、更轻便、更加有效率的某种工具的替代为止。

接着看广东东莞村头、广西武鸣马山、广东南雄太和岭、马坝窑头脚、中山龙穴等地出土的几件器物(图二:9~13)。这些实用端刃器基本上是平刃,且有阑,多数刃处有使用痕迹。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器物的阑部特征与相当多的刀形端刃器的阑部特征存在着相似或是后者的原型。东莞村头 T0908 ③:c 的单突阑是广东增城 GZ: 1<sup>[44]</sup>(图二:14)、湖北梹岗 M1: 4(图二:15)<sup>[45]</sup>等类状器的原型;广西武鸣马山的实用端刃器的阑部特征似是东莞村头 T0811 ③:b(图二:16)的原型;南雄太和岭、马坝窑头脚的实用端刃器的阑部特征似是三星堆 K1: 275(图二:17)<sup>[46]</sup>、K2 ③: 174(图二:18)<sup>[47]</sup>等类状器的阑部的原型;中山龙穴的实用端刃器的阑部特征与汪家屋场 JW: 2(图二:19)的相似。

众所周知,礼器通常是从生产工具或日常生活用具等实用器中发展而来的,如石斧后来发展为作为礼器的玉钺。用作礼器的鼎亦由炊食器发展而来。东周的布币形制亦是当时的农业工具钱、借鉴而来。同理,刀形端刃器应是起源于实用端刃器。

通过考察这些实用端刃器的年代,我们发现这些实用器物多数是遗址中采集的,无确切的具体年代。如兴宁加地凹山的几件实用端刃器据采

集者说与几何印纹软陶共存,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sup>[48]</sup>。平远寨顶上山的一起采集到的还有一些陶器、石兵器等,推测相当于西周时期<sup>[49]</sup>。邯郸洹沟的一件为遗址中出土,然而年代亦相当于商代晚期<sup>[50]</sup>。而刀形端刃器在龙山时代就已发现。因此尚难肯定地判断出它们与刀形端刃器之间的年代比照关系。但是,这些实用端刃器的存在起码为我们寻找和认识刀形端刃器的起源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方向和突破口。

赵宾福教授对本文的完成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 [1]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 [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 [3]李果、李季国《南丫岛发掘散记》,《文物天地》1991年第4期。
- [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5]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二)》,《故宫文物月刊》第11卷6期,台北1993年。
- [6]林巳奈夫《中国古代的石刀形玉器和骨铲形玉器》,原载《东方学报》第五十四册,京都1982年。之后收入《中国古玉的研究》,并作了很大的修改,吉川弘文馆1991年。杨美莉曾将其翻译成中文版《中国古玉研究》。
- [7]邓淑萍《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故宫文物月刊》第11卷第6期,台北1993年。
- [8]张学海《牙璋杂谈》,《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9]王永波《关于刀形端刃器的几个问题》,《故宫文物月刊》第12卷第3期,台北1994年。
- [10]郑光《略论牙璋》,《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1][13]涂白奎《论璋之起源及其形制演变》,《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
- [12]王永波《牙璋新解》,《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 [14]赵新来《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商代玉璋》,《文物》1966年第1期。
- [15][16][17][22][23][29]戴应新《石峁牙璋及其改作—石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札记》,《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8]赵成甫、董全生《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 [19]于秋伟、赵文俊《山东沂南县发现一组玉、石器》,《考

- 古》1998年第3期。于秋伟《山东沂南新发现的牙璋和玉器》,《故宫文物月刊》第15卷第11期,台北1998年。
- [20]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观音当汪家屋场遗址的调查》,《文物》1999年第1期。
- [21][4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 [24]陈德安《试论三星堆玉璋的种类、渊源及其宗教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27]赵炳焕、白秉乾《河南省新郑县新发现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
- [28]戴应新《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二)》,《故宫文物月刊》第11卷第6期,台北1993年。
- [30][41][4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61年第12期。
- [31][42][49]广东省博物馆、平远县博物馆《广东平远县寨顶上山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2期。
- [32][43][50]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洹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 [33]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贝丘、沙丘遗址和聚落形态》,《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34]蒋廷瑜《岭南出土石戈探微》,《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35][36]杨式铤《试论闽台粤先秦考古学文化关系》,《闽台古文化论文集》,《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文中提到南安飞华岩遗址有一件,无实物图。杨式铤《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夏商周文化南传迹象探微》,《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37]中山市博物馆《中山历史文物图集》,1991年。
- [38]安志敏《对香港考古学的几点认识》,《文物》1995年第7期。
- [39][44]杨式铤《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夏商周文化南传迹象探微》,《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 [40]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
- [45]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宝塔遗址与桅岗墓葬》,《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1987年。